

# 审计独立性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影响

——客户重要性视角

付 强<sup>1,2</sup>, 廖益兴<sup>2</sup>

(1. 湖北经济学院 会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2. 中原大学 商学院, 台湾 台北 320314)

**[摘 要]**新审计报告模式下,对细节信息的披露加大了审计师责任,加剧了审计师与客户(尤其是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企业)之间的冲突,审计师将面临独立性考验:严格执法以减轻自身责任还是妥协并帮助客户减少关键审计事项(KAM)披露以隐藏关键信息。我们发现:第一,盈余管理程度严重代表审计风险更大以及更多 KAM 被揭露的可能,我们在客户不重要的情况下发现了盈余管理与 KAM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在客户重要的情况下,两者关系不显著。客户越重要,严重盈余管理与更多 KAM 披露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越不明显。该结果可归因为经理人在盈余管理动机下游说审计师减少 KAM 披露以掩盖盈余管理。第二,国际四大的声誉机制和中注协约谈机制有助于改善独立性,审计师即使面对重要客户,也不会被经理人游说而减少 KAM 披露,而会根据盈余管理严重程度做出对等程度的 KAM 披露。研究结论有助于提醒监管层:尽管 KAM 改革给审计师带来压力,但是他们的独立性状况并没有改变,而是在有限的政策空间内帮助重要客户减少信息披露并将自身隐藏起来。

**[关键词]** KAM 披露; 盈余管理; 客户重要性; 审计独立性; 审计声誉; 审计报告改革; 会计监管

**[中图分类号]** F239.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2)01-0053-16

## 一、引言

自从中国财政部 2016 年 12 月发布《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4 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以下简称审计准则 1504 号)并实际运用以来,会计学界就展开了对关键审计事项(Key Audit Matters,以下简称 KAM<sup>①</sup>)的热烈研究。这些研究基本都是关于 KAM 经济后果,而这些经济后果中又几乎一面倒地对待 KAM 持正面态度<sup>[1-5]</sup>。然而,实务界甚至学术界也指出了 KAM 披露存在随意性和模板化情况<sup>[6]</sup>。因此,上述经济后果的研究片面强调 KAM 对审计师行为具有约束性的方面而忽略了审计师能动性的一面,审计师在面对巨大政策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监管压力的同时,也面对着部分重要客户要求减少披露和信息隐藏的压力,审计师也许会在双重压力之下面临独立性的挣扎考验,并作出差异化的审计行为。由此,本文从客户重要性角度出发,考察审计师独立性对 KAM 披露的影响,并希望借此揭示出审计师对 KAM 披露政策的能动反应。

从审计师角度来看,在审计报告中加入 KAM 提高了审计工作的透明度,强化了注册会计师的受托责任<sup>[4,7-8]</sup>,并且外部投资者可以据此对审计师的工作进行评判,由此提高外部监督的有效性<sup>[9]</sup>。从被审计客户角度来看,披露 KAM 如同打开审计工作的“操作间”,投资者通过 KAM 更加关注管理层判断,让管理层在“聚光灯”下倍感压力<sup>[10]</sup>。因此,审计报告改革对于审计师和被审计客户双方同时产生政策压力,尤其是被审计客户具有较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以及被审计客户支付较多的审计费用的情况下更加如此,从而这场改革创造出一个更加尖锐的“审计师-客户”矛盾关系,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观察审计独立性问题。

审计报告模式改革希望审计师披露明晰化的审计信息,而且现有实验研究的结论也证实多揭露 KAM 有助于减轻审计师的责任<sup>[11-12]</sup>。即便 KAM 是审计师认为已在审计过程中得以解决,被审计单位的风险已得到控制的事项<sup>[11]</sup>,相较于没有披露为 KAM 的项目,投资者还是会更加关注甚至怀疑 KAM 的潜在风险性。KAM 披露内容越多以及越深入,越可能加大投资者合理怀疑的范围,甚至对于有些隐藏真正风险的企业而言,会加大这些

**[收稿日期]** 2021-06-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JY034);湖北经济学院科研培育项目(PYZD201904)

**[作者简介]** 付强(1976—),男,湖北襄阳人,通讯作者,湖北经济学院会计学院讲师,中原大学商学院博士生,从事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 E-mail: fuqiang@hbue.edu.cn;廖益兴(1972—),男,中国台湾台北市人,中原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审计理论与实务研究。

① PCAOB 和 IAASB 都要求在新审计报告中加入关键审计事项,但是具体的称谓有差别,前者称为 Critical Audit Matters,简称 CAM;后者称为 Key Audit Matters,简称 KAM。考量到两者实质性差别不大,为了统一表述,本文都采用 KAM 表述。

企业风险被发现的概率。审计师也可能为了维护客户关系而迎合管理层需要,不披露对公司不利的风险事项<sup>[13]</sup>。因此,在新审计报告模式下,审计师的立场与经理人的立场发生冲突,他们必定在碰撞中寻求妥协。碰撞妥协的结果到底是倾向审计师还是倾向经理人取决于审计师的独立性。如果审计师独立性够强,他们必定在博弈的过程中更加强势,结果就会倾向审计师;反之,审计师独立性不够,他们在博弈中必定处于弱势,结果会倾向经理人。

我们的研究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试图证明审计师坚持独立立场以及丧失独立立场的情况下 KAM 披露的差异性。我们没有简单地认为他们的披露会更多或者更少,因为 KAM 之多寡理论上取决于审计师认知的风险和重要性。我们用盈余管理程度 *DA* 表示审计师的认知风险。审计师坚持独立性的时候,他们也许能够依照风险来认定 KAM。但当他们丧失独立性的时候,某些原本应该披露的项目会因为客户的反对而被隐藏。结果必然打破“依照风险认定 KAM”的规律。因此,与保持独立性比较,丧失独立性会让“风险 - KAM 披露”的正相关关系减弱。

既然独立性问题对 KAM 披露有影响,那么有没有什么机制能够缓解这种不利影响呢?本文第二部分检验内部机制(审计声誉机制)和外部机制(监管部门监督机制)的有效性。以往文献证实过上述机制在抑制独立性弊端中所产生的作用,我们将其借用到 KAM 披露问题上,不仅丰富了独立性相关的文献,更重要的是,我们将这些已经被证实有效的机制套用在 KAM 披露上面,能够得到预期的结果并能够做出合理解释,这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关于 KAM 披露隐含审计独立性信息的判断。

我们的研究具有以下学术贡献。第一,现有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审计报告改革给审计师带来的压力,进而预期这种压力会带来审计质量的改善,但却忽略了审计师能动性的一面,压力固然有可能让审计师对抗意图舞弊的审计客户,但也有可能让审计师与客户合谋去糊弄管理当局。我们的研究将揭示 KAM 披露结果不是外生的,它会受到审计师独立状况的影响。第二,我们的研究丰富了审计独立性的相关文献。不仅如此,我们认为审计报告模式的改革构造出一个比以往更加尖锐的“审计师 - 审计客户”关系环境,从而方便我们更清楚地观察审计独立性问题。以往审计师无须披露审计程序等细节信息,只须对最终审计结论是否标准无保留发表意见即可。实际上,非标意见比例是很小的,处于边缘地带的非标意见未见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没有披露审计细节,审计师有足够的说辞以及回旋空间去应付可能的监管检查或者投资人诉讼。相比较而言,改革之后对审计细节信息的披露压缩了回旋空间,从而加大了边缘状态下审计师与客户冲突的概率。鉴于审计独立性问题的实质是审计师关于外部物质利益诱惑与自身职业操守之间的选择问题,而相比较而言,新审计模式下提供了更多碰撞和选择的机会,因此更凸显出研究审计独立性问题的重要性。

## 二、文献回顾

我们的研究主要和两方面的文献有关。一是 KAM 披露的相关文献,我们回顾这方面的文献是要给出这样的证据:KAM 披露给审计师以及客户双方带来压力以及双方在压力之下对 KAM 披露的差异化态度;二是客户重要性的相关文献,审计师在面对不同重要程度客户的时候,他们的 KAM 披露会有差异化的表现,这就说明他们存在独立性问题,这部分内容我们将给出“采用客户重要性来衡量审计独立性”的文献依据。

### (一) KAM 制度改革与审计师压力

审计本身就是监督上市公司并为其财务报告的真实性提供合理保证。当被审计客户因为各种机会主义诱因想要实施盈余管理的时候,审计师和被审计客户的立场就会产生冲突。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盈余的大小、盈余有没有达到门槛以及是否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等。经常性地,审计报告最终的结果是审计师与被审计客户双方博弈妥协的结果。审计师因为监管压力以及自身信誉危机,必须尽可能地降低审计风险,审计客户则希望盈余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比如新股发行以及增发门槛、保壳门槛、经理人薪酬契约门槛、银行贷款或者债券发行门槛以及战胜分析师预测盈余等)。

自审计报告改革以后,KAM 披露成了双方可能产生分歧的另一个战场。因为 KAM 披露是与财报披露紧密联系的。财报内容本身与 KAM 披露在重要性认定方面存在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如果审计师与客户在某项财报项目上有分歧,那么在 KAM 披露认定上也同样如此。比如,审计师如果披露了资产减值的 KAM 并且交代了审计程序,那么投资人将会更感兴趣关注该财报项目并根据审计程序运用的有关信息来推估财报数字的真实有效

性。反之,如果审计师没有披露某项 KAM,那么依照审计准则 1504 号的规定,该事项应该不属于“对本期财报审计最为重要的事项”,一旦事后该事项发生问题而被监管部门处罚或者投资者诉讼,这将加大审计师的责任。因此,审计师有动机通过披露 KAM 来减轻自身风险和责任,而企业经理人有动机通过减少关键的 KAM 披露来隐藏财报中的盈余管理信息。

不仅如此,KAM 披露也加大了审计师和被审计客户的压力。在世界各个国家或组织的新审计报告具体实施之前,就有一些学者以及实务界人士对新审计报告准则实施以后审计师的责任问题表达了担忧,他们担心审计师会面临更多的诉讼<sup>[14-17]</sup>。Gimber 等认为在新审计报告模式下,审计师揭露的 KAM 需要更多估计和判断的空间<sup>[7]</sup>。审计师不仅能够预计到信息使用者对 KAM 信息的可能理解以及相应的投资选择,而且审计师应该明白他们的揭露行为与信息使用者的上述结果是有因果联系的。根据权利和责任相匹配的原则,既然审计师有更大的掌控力,那么他们就应该非常小心,因为他们要为他们能够掌控的结果负责。

审计师的压力不仅来自披露内容的精确性,而且来自要不要披露 KAM。因为是否披露 KAM 是按照重要性和审计风险程度决定的。在投资人的理解中,不披露 KAM 意味着审计师为财报中该项内容的真实有效性背书。也有研究认为 KAM 披露会减轻审计师责任。Brasel 认为如果真的发生财务错报,而审计师在之前公开披露了 KAM,相当于事先警告投资人财务报表相关领域内有错误陈述的可能性,那么,陪审员会认为“都事先警告过你们了,怎么不注意呢?”因此会减轻审计师的责任<sup>[11]</sup>。类似的,韩冬梅也认为多揭露 KAM 有助于减轻审计师的责任,她的解释是基于心理学中的有罪控制理论。即在负面事件发生时,如果行动者采取了合理、必要的防范措施,则很难因不利结果而引起对行动者的责备<sup>[12]</sup>。如果被审计单位经审计后仍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重大错报,且在新标准审计报告模式下审计人员已经在出具的标准审计报告中将其作为 KAM 并进行了披露,根据有罪推定理论,投资者会认为审计人员披露的 KAM 是为避免发生重大错报而采取的合理、必要的措施,即使日后出现了重大错报,投资者也很难责备审计人员。Brasel 认为如果审计师揭露的 KAM 与事后爆发的问题是有关系的,那么审计师可以减轻或免除责任;如果揭露的 KAM 与事后爆发的问题没有关系,审计师也相对的可以减轻责任<sup>[11]</sup>。这起码表明审计师曾努力的查核,而且表明该企业真的风险很大,也可以事先引起投资人警惕。最坏的是审计师不揭露 KAM,让投资人相信审计师,误以为企业没问题,结果最后蒙受损失。

在审计客户方面,如果企业财报完全真实透明,当然无须担心 KAM 披露了增量信息,相反的,企业甚至有可能对此持欢迎态度。他们聘用声誉良好、执法严格的审计师本身就已经向外界传达了“真金不怕火炼”的信号,因此有利于企业降低资金成本以及抬升股价。但是,如果企业经理人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而 KAM 披露提供了审计过程而非简单审计结果的信息,则这些信息将有利于投资人审慎评估审计结果的有效性和财报结果的真实性。而且 KAM 披露是依照重要性和审计风险程度排序并罗列的事项,KAM 披露出现在审计报告中本身就会起强调作用,会引起投资人更多的关注。在投资人投入更多关注以及多角度增量信息相互交叉和相互印证的情况下,企业经理人的盈余管理活动将更容易被怀疑甚至被识别,经理人盈余管理背后的意图将难以实现。所以,经理人与审计师就 KAM 披露内容进行沟通的时候,会尽可能地游说审计师减少该项 KAM 披露或者对该项 KAM 披露做模糊化处理。

## (二)客户重要性与审计师独立立场

Reynolds 研究了四大事务所的分所层面客户重要性对审计质量的影响,他发现四大分所的客户越重要,查核的财务报告越保守<sup>[18]</sup>。他把该结果归因为四大比较看重声誉,因为重要客户的企业规模比较大,比较引人注目,容易引起社会公众或者监管部门的关注,因此声誉问题相对凸显。Chung 等人分别从国际五大事务所以及分所层级客户重要性进行检验,没有发现客户重要性对审计质量的影响<sup>[19]</sup>。另外,他们检验了如果客户的机会主义行为比较严重或者盈余管理比较严重的时候,独立性问题会不会凸显,但结果不显著;他们还检验了如果公司治理比较好以及比较有审计专长,独立性问题能否得到缓解,结果也不显著<sup>[19]</sup>。Chen 分析了中国 2010 年之前和之后的审计独立性问题,他发现 2010 年之前客户越重要则越不会发布非标意见;但是 2010 年之后,由于投资者保护的加强,客户越重要则越有可能发布非标意见。因为审计师在做出审计决策的时候需要考虑客户(这是经济利益之所在),同时要考虑如果向客户妥协而丧失独立性带来的名誉损失、法律诉讼以及行政处罚。2010 年前后的制度改变加大了审计师不独立的法律和名誉成本,因此带来结果的改变<sup>[20]</sup>。Chi 等在 Chen 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台湾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问题,并发现台湾的非四大审计师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负相关,而四大审

计师客户重要性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不显著<sup>[21]</sup>。Chi 等同样把两种结果的差异性归因为审计声誉,因为四大审计师更加在乎审计声誉,故比较不会屈服于客户带来的经济利益;而非四大审计师声誉成本没有那么多高,故会容易因为大客户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丧失独立性<sup>[21]</sup>。

###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一) 审计独立性与 KAM 披露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1504 号,审计师在确认 KAM 时应该考虑三个方面:一是“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较高的领域或识别出的特别风险”;二是“与财务报表中涉及重大管理层判断(包括被认为具有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会计估计)的领域相关的重大审计判断”;三是“本期重大交易或事项对审计的影响”。其中前两个方面代表着盈余认定方面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因此都很可能与盈余管理有关。另外,冉明东和徐耀珍对 2016 年 A + H 股上市公司 KAM 披露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资产减值、收入确认以及公允价值计量这三种情形排名前列,占总体样本的 58.5%<sup>[22]</sup>。吴溪等根据 2017 年 A 股上市公司统计结果,发现 78% 的上市公司披露了与资产减值有关的 KAM 披露<sup>[23]</sup>。资产减值、收入确认以及公允价值计量都与应计制下的盈余确认有密切联系,都属于盈余管理中常见的高风险情形。按照审计准则 1504 号的要求,对于特定的审计项目而言,审计师感知的风险越大,则审计师将其披露为一项 KAM 的概率越大。审计师最关注的风险都是与客户盈余有关的,客户可能的盈余管理活动是审计的重点。可能的盈余管理活动越多以及金额越大,审计师越有可能将之披露为 KAM。单个项目披露概率加大,汇总起来,KAM 披露的项目总数就会比较多。

以上描述的是审计师依照审计准则的要求可达到的理想情况。但是在实务中,当审计师面对客户要求减少 KAM 披露的压力之时,审计师的披露可能会产生偏差。根据以上所述,审计报告模式改革给审计师和被审计客户双方带来了压力。KAM 披露会给双方带来未知的法律后果,也会因为增量信息而给投资人带来未知的市场后果。因为有实实在在的经济后果,所以披露 KAM 的内容、方式以及措辞都会在审计师与客户沟通的过程中被小心斟酌。审计师考虑到法律风险、监管风险以及自身声誉风险,客观真实地披露 KAM 应该是其理性选择,但是面对重要客户减少 KAM 披露的请求时,由于利益牵制的关系,审计师需要在两种力量的拉扯中做出挣扎选择。如果是非重要客户,减少 KAM 披露可能会让审计师面临较大的监管风险、法律诉讼风险以及声誉损失风险,这些成本损失大于非重要客户带来的经济利益,那么,非重要客户难以影响审计独立性,从而难以影响 KAM 披露。如果是重要客户,减少 KAM 披露带来的成本损失小于重要客户带来的经济利益,审计独立性将受到影响,继而影响 KAM 披露。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 KAM 制度改革这样一个新背景,事务所和客户无法清楚预知这项制度将来会产生怎样的管制后果,因此双方都表现得比较谨慎。无论业绩好坏,客户出于安全心理,都不希望自己的披露太出格。但是一般性安全心理不足以让他们在审计师面前足够坚持并态度强硬。客户盈余管理程度较高的时候,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诱因比较严重,他们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审计师的披露行为。这些机会主义诱因包括股票发行<sup>[24-26]</sup>、企业并购<sup>[27]</sup>、财务预期<sup>[28-29]</sup>以及经理人薪酬契约<sup>[30-32]</sup>等。KAM 中披露的审计风险点、审计程序运用以及在财务报告中索引的信息会引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可能由此做更加深入的分析 and 调查,或者加深对财报信息可靠性的怀疑,最后可能导致企业经理人凭借盈余管理达成机会主义企图的愿望落空,因此经理人有动机劝说审计师减少 KAM 关键内容的披露。

我们采用 KAM 披露项目数、KAM 披露索引项目数以及 KAM 披露文字数代表上市公司 KAM 披露程度。KAM 披露项目数比较多,表示审计师认定客户具有的风险领域较多以及重大交易或事项较多。KAM 披露项目有索引代表事项有较详细的财报信息做支撑,同时 KAM 披露与财报项目的对应关系比较清楚。KAM 披露文字数较多代表审计师详细解释了披露原因和审计应对程序,同时表达了审计师对该项目的重视程度。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H_{1a}$  和  $H_{1b}$ 。

$H_{1a}$ :其他条件一定,非重要客户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师披露的 KAM 项目数(KAM 披露索引项目数/KAM 披露文字数)越多。

$H_{1b}$ :其他条件一定,重要客户的盈余管理程度与审计师披露的 KAM 项目数(KAM 披露索引项目数/KAM 披露文字数)关系不显著。

(二) 审计内部机制(国际四大的审计师声誉)或者外部机制(中注协约谈)的调节作用

既然在给定的风险水平(DA)下,不同独立状态(IMP)的审计师在KAM披露上面呈现出差异,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审计内部机制(比如国际四大的审计师声誉)或者外部机制(比如中注协约谈)来改善审计师独立性,从而改善KAM披露呢?

审计师如果因为独立性问题而提供低质量审计服务,那么其他客户可能会因为声誉问题而选择解约<sup>[33]</sup>,因此,Chi等认为审计师的自身声誉考量是保证他们独立性的一个关键因素<sup>[21]</sup>。同时,DeAngelo和Linda认为较大的事务所如果做出有损审计独立性的事情,将付出更大的声誉代价<sup>[33]</sup>。国际四大因为能够提供质量更高的审计服务<sup>[5,34-39]</sup>,聘用国际四大审计的上市公司借此表明自己欢迎高质量审计的监督,以此向市场传递企业信息质量的积极信号,因此,与非四大相比较,国际四大基于自身声誉考虑将会表现出更高的审计独立性。

黄益雄和李长爱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以监管机制代替市场机制和司法机制为主要特征的市场<sup>[40]</sup>。Chen等发现在2000年以前(资本市场制度环境相对较弱),审计客户重要性会损害审计质量;但是2000年以后(针对审计失败的法律监管更加严厉),重要客户收到非标意见的概率变得更高<sup>[20]</sup>。Chen等将这个结果归因于监管制度的改进<sup>[20]</sup>。因为严格的监管制度促使审计师优先考虑审计失败的代价而不是从重要客户那里获得的经济利益。在众多的监管方式中,中注协的约谈制度因为其权威性和威慑力以及事前预防的特征被证实能够约束审计师,有助于改善审计质量<sup>[40-41]</sup>。更重要的是,从中注协的约谈主题来看,中注协关注的重点是上市公司频繁变更审计机构、处在盈亏边缘的上市公司、业绩大幅波动的上市公司、审计费用在同行业中处于较低水平的上市公司,这些约谈主题直指重大盈余管理动机以及审计师独立性,因此我们将中注协约谈作为保障审计独立性的外部机制。

综上所述,国际四大的审计师声誉机制和中注协约谈机制分别通过加大审计声誉成本以及监管惩治成本来改善审计独立状况。我们之前已经证实因为重要客户对审计师减少KAM披露的游说,客户重要性会弱化DA与KAM披露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那么四大声誉和中注协约谈应该能够通过改善审计独立性而减少客户重要性对“DA-KAM披露关系”的弱化作用。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sub>2</sub>和H<sub>3</sub>。

H<sub>2</sub>:在非国际四大事务所,客户重要性对于“DA-KAM披露正向关系”的弱化作用显著;而在国际四大事务所,客户重要性对于“DA-KAM披露正向关系”的弱化作用不显著。

H<sub>3</sub>:在没有中注协约谈的情况下,客户重要性对于“DA-KAM披露正向关系”的弱化作用显著;而在有中注协约谈情况下,客户重要性对于“DA-KAM披露正向关系”的弱化作用不显著。

## 四、研究设计

(一) 样本和数据

本文采用A股上市公司2017—2018年数据<sup>①</sup>,其中KAM披露数据是从巨潮资讯网取得上市公司审计报告,然后手工收集得到。上市公司财务特征数据来自于上市公司年报并经过计算得到。初始数据2507个,剔除缺失值数据以及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后,得到1925个数据。所有的连续变量经过1%的Winsorize处理。

(二) 变量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KAM,采用KAM\_NUM(KAM的项目数)、KAM\_REF(KAM有索引的项目数<sup>②</sup>)以及KAM\_WORD(KAM的文字多少)三种方式进行衡量<sup>③</sup>。KAM披露项目数比较多,表示审计师认定客户具有的风险领

①我们着手做这篇论文始于一年前,当时2019年的年报还没有完全出来。因此我们只能搜集截至2018年的数据。我国KAM披露始于2016年,但是2016年只有A+H公司几十家的数据。这些公司规模更大,且大多数是国有企业,所以我们没有手工收集2016年的数据,最后的数据是2017年和2018年。

②比如新和成(002001)2018年年报中关键审计事项就有这样的描述“相关信息披露详见本节五20、七32及十五1(2)。”类似这样指出KAM在财报中的具体位置,我们就认为KAM是建立了索引关系的。

③首先,很多文献都采用KAM项目数以及KAM文字数作为度量指标,比如陈丽红等<sup>[42]</sup>以及曾家璿和史雅男<sup>[43]</sup>。除此以外,王木之和李丹也认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数量和文本字数越多,审计师确定关键审计事项的理由和应对程序也就越详细<sup>[2]</sup>。其次,中国台湾TEJ数据库中披露了关键审计事项的三个内容,即我们文中所采用的三种指标:KAM项目数、KAM文字数以及KAM索引项目数。最后,至于这些指标对是否投资者重要,也有相关的文献证据。比如李晓月等在论文的补充检验部分证实了较多的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够增加审计失败给审计人员带来的责任<sup>[7,44-45]</sup>,可能代表更强的保险价值。李奇凤,路军伟发现总体而言,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个数越多、篇幅越长,越具有信息含量<sup>[46]</sup>。

域较多以及重大交易或事项较多。*KAM* 披露项目有索引代表事项有较详细的财报信息做支撑,同时 *KAM* 披露与财报项目对应关系比较清楚。*KAM* 披露文字数较多代表审计师详细解释了披露原因和审计应对程序,同时也表达了审计师对该项目的重视程度。

2.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 *DA*(盈余管理)<sup>①</sup>,我们采用修正琼斯模型中非裁决性应计的绝对值表示盈余管理。

3. 调节变量

本文的调节变量是 *IMP*(客户重要性)<sup>②</sup>,第 *t* 年 *i* 客户对于事务所的重要性等于第 *t* 年某事务所的第 *i* 个客户公司的审计收费除以该事务所第 *t* 年所有客户的审计收费合计数。

(三) 模型

为检验  $H_{1a}$  和  $H_{1b}$ ,我们列出模型 1;为了检验  $H_2$  和  $H_3$ ,我们列出模型 2。两个模型如下所示:

$$KAM_{i,t} = \alpha_0 + \alpha_1 DA_{i,t} + \alpha_3 controls_{i,t} + \varepsilon \tag{1}$$

$$KAM_{i,t} = \alpha_0 + \alpha_1 DA_{i,t} + \alpha_2 IMP_{i,t} + \alpha_3 DA_{i,t} \times IMP_{i,t} + \alpha_3 controls_{i,t} + \varepsilon \tag{2}$$

模型 1 和模型 2 中的 *KAM* 表示 *KAM* 披露,分别采用 *KAM\_NUM*、*KAM\_REF* 以及 *KAM\_WORD* 三种方式衡量。因变量 *KAM* 披露项目数以及 *KAM* 披露索引项目数是有序排列,我们采用 Oprobit 回归,*KAM* 披露文字数采用 OLS 回归。

模型 1 检验盈余管理对 *KAM* 披露的影响,其中的控制变量有 *SIZE*(企业规模)、*LEV*(财务杠杆)、*GROWTH*(企业发展程度)、*ROA*(资产净利率)、*LOSS*(是否亏损)、*CFO*(现金流量)、*REVREC*(应收账款与存货)以及 *C\_SCORE*(会计稳健性)。

模型 2 检验审计师面对重要以及非重要客户的时候对于 *KAM* 披露的差异化影响,模型 2 只是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 *IMP* 以及交乘项  $DA \times IMP$ 。因为我们判断审计师在面对重要客户的时候会减少 *KAM* 披露以迎合客户隐藏盈余管理信息的要求,所以我们预期模型 2 的交乘项系数为负。文中所有变量以及定义在表 1 中列示。

表 1 变量名称以及定义

变量名	变量说明
<i>KAM_NUM</i>	<i>KAM</i> 项目数
<i>KAM_REF</i>	具有索引关系的 <i>KAM</i> 项目数
<i>KAM_WORD</i>	<i>KAM</i> 文字个数的自然对数
<i>DA</i>	修正琼斯模型中裁决性应计的绝对值
<i>IMP</i>	客户重要性:第 <i>t</i> 年某事务所的第 <i>i</i> 个客户公司的审计收费除以该事务所第 <i>t</i> 年所有客户的审计收费合计数
<i>SIZE</i>	公司规模: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i>LEV</i>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总资产
<i>GROWTH</i>	成长速度: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
<i>ROA</i>	企业业绩:资产净利率
<i>LOSS</i>	是否亏损(虚拟变量):第 <i>t</i> 年公司是否亏损:1 - 是;0 - 否
<i>CFO</i>	现金流量: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除以第 <i>t</i> 年企业资产总额
<i>REVREC</i>	应收款与存货:企业第 <i>t</i> 年应收账款与存货余额除以第 <i>t</i> 年资产总额
<i>C_SCORE</i>	会计稳健性,参照 Khan and Watts <sup>[48]</sup> 的 C-Score 模型计算结果
<i>FORSUBS</i>	经营复杂性,以设立海外子公司的数量的自然对数表示。
<i>FER</i>	财务费用率,等于财务费用除以营业收入
<i>BOARD</i>	董事会规模,等于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i>RPTLEND</i>	大股东占款,等于其他应收款除以资产总额
<i>AUDCOMM</i>	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虚拟变量,是取值为 1,否则为 0
<i>BIG4</i>	是否国际四大事务所,虚拟变量,是取值为 1,否则为 0
<i>BIG10</i>	是否国内十大事务所,虚拟变量,是取值为 1,否则为 0
<i>IND</i>	行业虚拟变量
<i>YEAR</i>	年度虚拟变量

五、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是样本描述性统计,从表 2 中我们看到 *KAM* 披露项目数变动很小,最少的披露了 1 项,最多披露 6 项。而且 50% 的上市公司 *KAM* 披露在 2 项之内。具有索引关系的 *KAM* 披露与全部 *KAM* 披露项目数差别不大,说明大部分的 *KAM* 披露都是有索引关系的。*KAM* 披露文字数平均 1253 字,最少 108 字,最多

①虽然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都可以操纵企业盈余,但是对于审计师感受的审计风险不一样。真实盈余管理具有更低的法律风险和审计风险<sup>[47]</sup>。比如,企业为了追求短期利益放弃企业研发,短期内减少了研发支出,而短期收入并不会减少(因为研发带来的收入一般是长期的),所以通过这种方式企业可以增加短期盈余。但是这样做审计师挑不出毛病,企业没有违背会计准则,审计师也没有违背审计准则。因此,这种真实盈余管理不会对审计师造成压力,当然也就不会对 *KAM* 披露产生压力。另外,从 *KAM* 披露的实践看,我们看到企业披露的 *KAM* 项目大都跟应计盈余管理有关(无论是收入截止日的确定还是资产减值的处理都涉及应计处理),但是基本看不到有什么 *KAM* 项目比较明确地跟真实盈余管理有关。基于以上理由,在我们的研究议题下,相较于真实盈余管理,应计盈余管理与 *KAM* 披露有更强的逻辑关联性,因此,我们的研究只考察应计盈余管理而不考虑真实盈余管理。

②审计独立性并非是一个变量来衡量,而是通过审计重要性 *IMP* 的调节关系来体现。具体的,审计师在面对重要客户和非重要客户的时候,做出的审计行为是具有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性体现审计妥协的,这就是审计独立性。模型 1 并没有体现出独立性,但是模型 2 体现出独立性。

3596 字<sup>②</sup>。

图 1 显示了不同 DA 程度下的 KAM 披露结果。首先,从图 1 中我们看到就总体趋势而言, *KAM\_NUM*、*KAM\_REF* 和 *KAM\_WORD* 都随着 DA 的减少而减少。*KAM\_NUM* 和 *KAM\_WORD* 折线的走势大致相同,但它们不是单调递减的折线,而是类似于“L”形状。对此我们有以下两个解释:第一,因为 KAM 披露是按照重要性程度以及审计风险排序并罗列的,如果不是 DA 程度很高则很难列入 KAM 披露,所以 DA 程度最高的等份容易被列报 KAM 披露,而 DA 程度较低的若干等份都难以列入 KAM 披露,图中“3”“4”“5”等分就不再呈现单调递减走势;第二,张继勋等研究我国新审计报告披露实践发现,审计报告中存在针对 KAM 的结论性评价和无结论性评价两种形式,其中结论性评价主要有 KAM 是合理的、KAM 金额可接受和没有发现 KAM 存在重大问题三种表述<sup>[49]</sup>。审计师在审计调整之前也许发现诸多风险点,但是经过审计调整之后已经将这些风险降低至合理或者可接受的程度。在这些情况下,KAM 只代表调整前的风险发现以及调整中的审计努力,而审计调整之后的 DA 是小的。因此,在 DA 程度较低的部分,有些 KAM 也会多,故而造成 DA 与 KAM 的非单调递减分布。

其次,比较奇怪的是 *KAM\_REF* 折线中 DA 的第“1”和第“2”等分,DA 最高的等份反而 *KAM\_REF* 较少。DA 最严重的这一等份其实也是经理人盈余管理动机最大的等分,也是审计师和经理人争论最为激烈的等分以及审计师接受独立性考验最为严峻的等份。

最后,我们观察到在 DA 的“2”等分处,*KAM\_REF*、*KAM\_WORD* 折线内凹而 *KAM\_NUM* 折线外凹。三者不同之处在于前两者需要财报的具体数据作为证据支持,相当于把审计过程以及审计结果呈现的更加清楚。相较于 *KAM\_NUM* 这种一般性情况披露,有盈余管理动机的经理人更加难以接受 *KAM\_REF* 这种有数据支持的、就具体项目而言的详细化披露。在无法保证彻底隐藏有关 KAM 披露的情况下,只披露项目大类而不披露具体细节就成为博弈妥协的结果。

(二) 相关系数矩阵

表 3 是相关系数矩阵,从表 3 可以看到 *KAM\_NUM*、*KAM\_REF* 和 *KAM\_WORD* 三者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强,但是 DA 与 *KAM\_NUM* 显著正相关,与 *KAM\_REF* 以及 *KAM\_WORD* 之间的关系却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KAM\_NUM* 是依照审计风险(当然也是依照会计风险)排序并列报的项目,因此 DA 程度严重会导致 *KAM\_NUM* 的项目数增多。与 *KAM\_NUM* 不同,*KAM\_REF* 有明确的索引信息,*KAM\_WORD* 有比较详细的文字解释,因此与 *KAM\_NUM* 相比较,后两者属于实质性信息披露,对于 DA 较强同时有较强盈余管理诱因的企业而言,不得不保留 *KAM\_NUM* 这种显性的披露<sup>③</sup>而一定程度上减少 *KAM\_REF* 和 *KAM\_WORD* 这些实质性信息披露,这种做法是妥协后的最优选择。*SIZE* 与 KAM 披露显著正相关,是因为大企业的业务复杂,风险点多,因为重大事件而披露

表 2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	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方差
<i>KAM_NUM</i>	1925	2.088	2	1	6	0.678
<i>KAM_REF</i>	1925	1.943	2	0	6	1.214
<i>KAM_WORD</i>	1925	7.057	7.098	4.691	8.188	0.410
<i>DA</i>	1925	0.066	0.044	0	0.510	0.0727
<i>IMP</i>	1707 <sup>①</sup>	0.0133	0.0047	0.0004	1	0.0346
<i>SIZE</i>	1925	22.12	22.02	18.18	26.52	1.077
<i>LEV</i>	1925	0.367	0.352	0.0025	1.683	0.212
<i>GROWTH</i>	1925	0.312	0.0865	-0.998	139.5	3.596
<i>ROA</i>	1925	0.0250	0.0246	-2.330	0.604	0.104
<i>LOSS</i>	1925	0.176	0	0	1	0.381
<i>CFO</i>	1925	0.0270	0.0244	-0.455	0.529	0.0759
<i>REVREC</i>	1925	0.0300	0.0136	-6.064	0.978	0.179
<i>C_SCORE</i>	1925	28.73	9.196	-3200	11000	4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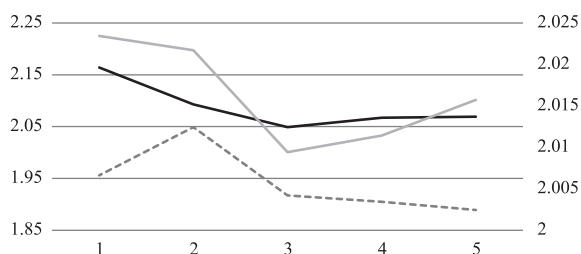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 DA 程度下的 KAM

注:图 1 中浅色实线、虚线以及深色实线折线分别表示 *KAM\_NUM*、*KAM\_REF* 以及 *KAM\_WORD*,前两者采用左边坐标数字,后者采用右边坐标。横坐标表示 DA,我们将 DA5 等分,从 1 到 5 表示 DA 越来越小。

<sup>①</sup>*IMP* 的缺失值会丢失一部分数据。考虑到我们手工收集的 KAM 样本量并不多,因此我们保留了 KAM 的所有数据。在交乘项模型中因为有 *IMP* 的交乘项,样本量会降为 1707 个。

<sup>②</sup>变量 *KAM\_WORD* 是实际文字数取自然对数的结果,我们用指数还原为实际文字数。

<sup>③</sup>*KAM\_NUM* 主要表达有没有某个项目,而 *KAM\_REF* 以及 *KAM\_WORD* 表达如何披露这个项目。很多时候,有没有这个项目是很明显让人看到的,但是模糊焦点以及轻轻带过不太容易让人观察出来。

KAM 的概率更高。*LEV* 与 *KAM* 披露显著负相关,是因为高比例的财务杠杆会带来巨大的财务风险,进而引起高审计风险。另外,业绩更好以及现金流更加充沛的企业其经理人进行盈余管理的诱因比较低,审计风险点较少,因此也会比较少披露 *KAM*。同样的,*ROA*、*LOSS* 和 *CFO* 这三项都与 *KAM\_NUM* 具有非常显著的关系,但是相比较而言,与 *KAM\_REF* 以及 *KAM\_WORD* 的显著性没有那么强烈,这同样是因为业绩较差以及现金流紧张的企业盈余管理诱因较大,经理人希望减少实质性披露以隐藏关键信息。

表3 相关系数矩阵

	<i>KAM_NUM</i>	<i>KAM_REF</i>	<i>KAM_WORD</i>	<i>DA</i>	<i>IMP</i>	<i>SIZE</i>	<i>LEV</i>	<i>GROWTH</i>	<i>ROA</i>	<i>LOSS</i>	<i>CFO</i>	<i>REVREC</i>	<i>C_SCORE</i>
<i>KAM_NUM</i>	1												
<i>KAM_REF</i>	0.495 ***	1											
<i>KAM_WORD</i>	0.589 ***	0.342 ***	1										
<i>DA</i>	0.070 ***	0.0300	0.0280	1									
<i>IMP</i>	0.072 ***	0.0150	0.057 **	0.0220	1								
<i>SIZE</i>	0.126 ***	0.063 ***	0.116 ***	-0.08 ***	0.1 ***	1							
<i>LEV</i>	0.120 ***	0.079 ***	0.064 ***	0.121 ***	0.038 *	0.339 ***	1						
<i>GROWTH</i>	0.017	0.006	0.015	0.098 ***	0.12 ***	0.02	0.02	1					
<i>ROA</i>	-0.079 ***	-0.03	-0.041 *	-0.207 ***	-0.043 *	0.107 ***	-0.228 ***	0.026	1				
<i>LOSS</i>	0.119 ***	0.037 *	0.073 ***	0.180 ***	0.0300	-0.139 ***	0.157 ***	-0.016	-0.495 ***	1			
<i>CFO</i>	-0.055 **	-0.018	-0.032	-0.14 ***	-0.05 **	0.068 ***	-0.081 ***	0.072 ***	0.16 ***	-0.14 ***	1		
<i>REVREC</i>	-0.007	0.004	-0.013	-0.041 *	-0.041 *	0.110 ***	-0.008	0.116 ***	0.124 ***	-0.14 ***	0.215 ***	1	
<i>C_SCORE</i>	0.027	-0.005	0.015	0.016	0.002	0.177 ***	0.075 ***	-0.04 *	0.001	0.023	0.011	0.02	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

### (三) 多变量回归结果

表4 展示的是审计师面对重要客户以及非重要客户的时候,其 *KAM* 披露是否存在差异。我们以客户重要性 *IMP* 的均值进行区分,当客户重要性大于均值的时候,认定为重要客户,当小于均值的时候,认定为非重要客户。表4 的前三列是非重要客户结果,当审计师面对非重要客户的时候,他们相对能够秉持独立立场,做出的 *KAM* 披露大致符合客户的风险程度。因此 *DA* 与 *KAM* 基本呈现正相关(*NUM* 与 *REF* 都与 *DA* 显著正相关,*WORD* 与 *DA* 不显著,但是也处于显著性的边缘)。后三列是重要客户结果。因为面对重要客户,审计师相对容易丧失独立性的要求做出回应,从而 *KAM* 披露不能符合应有的风险程度,并最终导致 *DA* 与 *KAM* 关系不显著。

表5 展示的是审计师客户重要性对于“*DA-KAM* 披露关系”的调节作用。其中 Panel A 展示的是全样本回归结果,Panel B 展示的是按照 *DA* 四等分以后的分组回归结果。如果客户对于审计师不那么重要,审计师将根据企业风险来决定 *KAM* 披露的罗列,那么 *DA* 对于 *KAM* 披露将产生正相关关系;如果客户对于审计师比较重要,那么独立性将受到影响,原本应该列报的 *KAM* 披露会由于经理人的游说而减少,进而导致 *DA* 与 *KAM* 披露的关系变得不显著。从表5 的 Panel A 我们看到交乘项 *DA* × *IMP* 的系数显著负相关,这表示 *IMP* 对于“*DA-KAM* 披露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即原本 *DA* 和 *KAM* 披露之间的正相关性随着客户重要性的增加会变得不再显著。

表4 重要客户和非重要客户的分组样本结果( $H_{1a}$ 和 $H_{1b}$ )

	客户不重要			客户重要		
	<i>NUM</i>	<i>REFER</i>	<i>WORD</i>	<i>NUM</i>	<i>REFER</i>	<i>WORD</i>
<i>DA</i>	1.0093 *	0.8368 *	0.275	0.395	-0.0206	-0.101
	(1.8926)	(1.6766)	(1.4810)	(0.6326)	(-0.0348)	(-0.4473)
<i>SIZE</i>	0.1808 ***	0.1180 ***	0.0563 ***	0.1416 ***	0.0507	0.0513 ***
	(4.6228)	(3.2490)	(4.1757)	(3.0035)	(1.1438)	(3.0428)
<i>LEV</i>	0.217	0.4316 **	0.0556	0.383	0.201	-0.00250
	(1.0996)	(2.3327)	(0.8088)	(1.5847)	(0.8841)	(-0.0291)
<i>GROWTH</i>	0.126	0.0150	0.0764 **	0.2400 **	0.112	0.0703
	(1.4862)	(0.1871)	(2.5793)	(2.0276)	(0.9802)	(1.6263)
<i>ROA</i>	-0.695	-0.250	-0.211	-0.501	0.385	0.0242
	(-1.0075)	(-0.3883)	(-0.8756)	(-0.6090)	(0.4920)	(0.0816)
<i>LOSS</i>	0.2204 *	0.00750	0.00630	0.3614 ***	0.2640 **	0.1704 ***
	(1.8306)	(0.0667)	(0.1499)	(2.6281)	(2.0314)	(3.4309)
<i>CFO</i>	-0.557	-0.404	-0.146	-0.383	-0.522	-0.0176
	(-1.0828)	(-0.8411)	(-0.8134)	(-0.5663)	(-0.8221)	(-0.0728)
<i>REVREC</i>	-0.358	-0.239	-0.185	-1.9415 ***	-0.9346 *	-0.6508 ***
	(-0.9258)	(-0.6655)	(-1.3814)	(-3.6305)	(-1.8595)	(-3.4258)
<i>C SCORE</i>	-0.000100	-0.0004 **	0	0.000200	0.000200	0
	(-0.6433)	(-2.2434)	(0.1691)	(0.6473)	(0.6971)	(0.2730)
<i>IND/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截距项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1260	1260	1260	665	665	665
<i>LR CHI<sup>2</sup>/F</i>	68	57	2.806	68	41	2.782
<i>PSEUDO R<sup>2</sup>/R<sup>2</sup></i>	0.0290	0.0164	0.0559	0.0497	0.0212	0.102

注:表格中展示了相关系数大小,相关系数下面括号中是 *z* 值(*t* 值),在系数右上角的星星表明双尾检定下的显著性。其中 \* 表示 10% 的显著水平, \*\* 表示 5% 的显著水平, \*\*\* 表示 1% 的显著水平。*KAM\_NUM* 和 *KAM\_REF* 模型采用 Oprobit 回归,*KAM\_WORD* 采用 OLS 回归,下同。



表 5 客户重要性的影响

Panel A: 全样本结果				Panel B: 按照盈余管理程度分组回归的结果				
	(1)	(2)	(3)	<i>KAM_NUM</i>				
	<i>KAM_NUM</i>	<i>KAM_REF</i>	<i>KAM_WORD</i>	<i>DA</i> 最高	<i>DA</i> 较高	<i>DA</i> 较低	<i>DA</i> 最低	
<i>DA</i>	1.1152 ** (2.4814)	0.7720 * (1.8646)	0.200 (1.2721)	<i>IMP</i>	-5.043 ** (-2.2760)	3.583 *** (3.3496)	-0.146 (-0.0507)	3.6140 * (1.7786)
<i>IMP</i>	4.9941 *** (4.2950)	1.8116 * (1.6770)	1.1129 *** (2.7082)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i>DA</i> × <i>IMP</i>	-42.4200 *** (-3.1600)	-18.3516 * (-1.8888)	-6.9626 * (-1.8343)	<i>IND/YEAR</i>	YES	YES	YES	YES
<i>SIZE</i>	0.1352 *** (4.4165)	0.0719 ** (2.5110)	0.0530 *** (4.8863)	截距项	YES	YES	YES	YES
<i>LEV</i>	0.2934 * (1.8580)	0.3880 *** (2.6226)	0.0410 (0.7293)	<i>N</i>	414	429	427	437
<i>GROWTH</i>	0.0197 ** (2.3231)	0.0094 (1.2546)	0.00450 (1.6038)	<i>LR Chi<sup>2</sup>/F</i>	41	64	23	53
<i>ROA</i>	0.338 (1.0093)	0.163 (0.5295)	0.0731 (0.6115)	<i>PSEUDO R<sup>2</sup>/R<sup>2</sup></i>	0.0509	0.0727	0.0284	0.0667
<i>LOSS</i>	0.4267 *** (4.7690)	0.115 (1.3773)	0.0857 *** (2.6808)	<i>KAM_REFER</i>				
<i>CFO</i>	-0.6849 * (-1.7605)	-0.238 (-0.6580)	-0.208 (-1.5102)	<i>DA</i> 最高	<i>DA</i> 较高	<i>DA</i> 较低	<i>DA</i> 最低	
<i>REVREC</i>	-0.3952 * (-1.6531)	-0.344 (-1.5530)	-0.120 (-1.4248)	<i>IMP</i>	-3.259 * (-1.9042)	1.378 (1.2921)	-4.492 (-1.6174)	2.912 (1.5392)
<i>C_SCORE</i>	0 (0.4432)	0 (0.2743)	0 (0.8962)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i>IND/YEAR</i>	YES	YES	YES	<i>IND/YEAR</i>	YES	YES	YES	YES
截距项	YES	YES	5.1712 *** (7.4291)	截距项	YES	YES	YES	YES
<i>N</i>	1707	1707	1707	<i>N</i>	414	429	427	437
<i>LR Chi<sup>2</sup>/F</i>	116	63	3.21	<i>LR Chi<sup>2</sup>/F</i>	1.114	2.087	0.545	2.492
<i>Pseudo R<sup>2</sup>/R<sup>2</sup></i>	0.035	0.0133	0.0508	<i>PSEUDO R<sup>2</sup>/R<sup>2</sup></i>	0.0696	0.119	0.0342	0.137

在前面的论述中, 审计师与客户关于 KAM 披露发生冲突的区域并非分布在 *DA* 整体连续区间, 而主要集中在 *DA* 比较高的区间。Panel A 中的 *DA* 采用的是连续变量, 不容易清楚看到不同程度 *DA* 的结果。为了凸显 *DA* 较高区间审计师与客户的冲突以及他们在激励冲突中的独立性表现, 我们考察了 *DA* 的分组检验结果。

在表 5 的 Panel B 中, 我们将 *DA* 从大到小排序并进行四等分, 以此区分为 *DA* 最高、*DA* 较高、*DA* 较低以及 *DA* 最低组。在每个组里面, 我们认定审计师的认知风险大致相同。因此, 理论上对于具体的组, *KAM* 披露数目也应该大致相同。但是从 Panel B 所显示的结果来看, 在 *DA* 最高组, *IMP* 与 *KAM* 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即客户越重要, *KAM* 披露越少。而在其他三个组, *IMP* 与 *KAM* 关系不显著, 甚至有些呈现正相关关系。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曾提到: 审计师和客户在一般情况下不太会发生立场的激烈碰撞, 只有在审计师感知的风险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双方才会对于 *KAM* 披露产生较大分歧。此时, 审计师面对重要客户时明显比面对非重要客户时的 *KAM* 披露更少, 说明在这样的极端情况下, 审计师向客户妥协了, 即独立性问题影响了 *KAM* 披露。至于在其他三组, *IMP* 在有些情况下甚至与 *KAM* 显著正相关, 这是因为 *DA* 不严重的时候, 意味着客户并没有那么在意 *KAM* 披露, 甚至于他们根本就没有给审计师这方面的压力。但是对于审计师而言, 重要客户一般规模更大, 更容易引起监管部门以及社会媒体的关注。在没有客户压力的情况下, 为了应付可能的监管, 审计师出于谨慎的考虑做出了更多的 *KAM* 披露。

综上所述, 我们按照客户重要性分组为重要客户和非重要客户, 并发现对于非重要客户, 审计师的 *KAM* 披露与企业风险大致相关, 而对于重要客户, 审计师并没有依照企业风险进行合理的 *KAM* 披露。为了检验这两种情况的差异性, 我们采用客户重要性作为调节变量, 然后发现随着重要性的增加, *DA* 对于 *KAM* 披露的正向作用会减弱。因为重要性增加意味着独立性减弱, 审计师在与经理人的博弈中将处于弱势地位, 审计师卸责需要屈从于经理人隐藏信息的需要, 从而原本 *DA* 与 *KAM* 披露的正相关关系不再显著。

表 6 展示的是国际四大声誉机制对于改善审计独立性所产生的作用。从表 6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 *KAM\_NUM*, 抑或是 *KAM\_REF* 以及 *KAM\_WORD*, 对于非四大样本而言, 交乘项 *DA* × *IMP* 的系数显著为负; 但是对于国际四大样本而言, 交乘项 *DA* × *IMP* 的系数都不显著。这是因为对于非四大事务所而言, 他们不是那么看重审计

声誉,审计声誉机制对于审计独立性产生的改善作用有限,在相对不独立的状况下,尤其面对 *DA* 比较大、企业经理人机会主义诱因强烈的情况下,非四大审计师非常容易对重要客户做出妥协,帮助客户减少 *KAM* 披露以掩盖关键信息。因此, *IMP* 对于“*DA-KAM* 披露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从而交乘项 *DA × IMP* 的系数显著为负。但是对于国际四大事务所而言,如果审计不独立,将对审计声誉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并产生巨大代价。故四大审计师即使在面对重要客户的时候也不退让,坚持依据 *DA* 所呈现出来的风险状况给出对应程度的 *KAM* 披露,所以 *IMP* 对于“*DA-KAM* 披露”原有的正相关关系所产生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导致交乘项 *DA × IMP* 的系数不显著。

表 7 展示的是中注协约谈机制对于改善审计独立性所产生的作用。从表 7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 *KAM\_NUM*,抑或是 *KAM\_REF* 以及 *KAM\_WORD*,对于非约谈样本而言,交乘项 *DA × IMP* 的系数显著为负;但是对于中注协约谈样本而言,交乘项 *DA × IMP* 的系数都不显著。对于中注协约谈的事务所,约谈行为有可能对相关机构和人员形成压力<sup>[41]</sup>,在监管压力下,事务所通过内部质量控制,可能会追加审计程序,获取更多审计证据等<sup>[40]</sup>。在中注协约谈

的监管压力和目光注视下,事务所很难屈从于重要客户,不太容易被重要客户游说而减少 *KAM* 披露,因此, *IMP* 对于“*DA-KAM* 披露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表现得不明显,从而交乘项 *DA × IMP* 的系数不显著。但是对于非约谈事务所,他们没有被中注协关注,也没有那么大的监管压力,相比较而言,他们有更多机会帮助重要客户减少 *KAM* 披露以掩藏关键信息。因此, *IMP* 对于“*DA-KAM* 披露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从而交乘项 *DA × IMP* 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 6 假设 2 结果

	四大 NUM	非四大 NUM	四大 REF	非四大 REF	四大 WORD	非四大 WORD
<i>DA</i>	-6.301 (-1.4233)	1.2859 *** (2.7893)	-2.265 (-0.5683)	0.8496 ** (2.0125)	-1.400 (-0.8417)	0.200 (1.2578)
<i>IMP</i>	2.868 (0.7753)	5.0602 *** (4.0517)	2.647 (0.7503)	1.699 (1.4843)	1.248 (0.8035)	1.0588 ** (2.4629)
<i>DA × IMP</i>	-110 (-0.3244)	-44.0552 *** (-3.0507)	-320 (-0.9812)	-17.6097 * (-1.7577)	-20.36 (-0.1504)	-6.6313 * (-1.711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截距项	YES	YES	YES	YES	5.68 *** (3.12)	5.77 *** (22.37)
N	84	1623	84	1623	84	1623
LR Chi2/F	44	99	41	49	1.276	2.946
Pseudo R <sup>2</sup> /R <sup>2</sup>	0.2403	0.0316	0.1674	0.0109	0.328	0.0492

注:CONTROLS 是控制变量,包括 *SIZE*、*LEV*、*GROWTH*、*ROA*、*LOSS*、*CFO*、*REVREC*、*C\_SCORE*。

表 7 假设 3 的结果

	约谈 NUM	非约谈 NUM	约谈 REF	非约谈 REF	约谈 WORD	非约谈 WORD
<i>DA</i>	1.012 (1.1295)	1.0209 * (1.8474)	-0.430 (-0.5119)	1.0987 ** (2.1578)	-0.329 (-1.0149)	0.293 (1.5363)
<i>IMP</i>	4.323 (0.9649)	4.9852 *** (4.0533)	-4.339 (-1.0024)	2.1277 * (1.8709)	-0.952 (-0.5624)	1.2154 *** (2.8596)
<i>DA × IMP</i>	-12.16 (-0.2200)	-43.7280 *** (-3.0138)	63.74 (1.2142)	-22.9253 ** (-2.2469)	26.70 (1.3083)	-7.9833 ** (-2.037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截距项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548	1159	548	1159	548	1159
LR Chi2/F	44	97	43	55.6	1.429	2.800
Pseudo R <sup>2</sup> /R <sup>2</sup>	0.0434	0.0422	0.0277	0.0171	0.0714	0.0649

注:CONTROLS 是控制变量,包括 *SIZE*、*LEV*、*GROWTH*、*ROA*、*LOSS*、*CFO*、*REVREC*、*C\_SCORE*。

## 六、稳健性检验

### (一) 审计师个人层面的客户重要性

Chen 等和 Chi 等都认为某一特定客户对于单一审计师而言(相较于该客户对于事务所或者是分所而言)更具经济重要性,事务所的客户很多,一个客户对于事务所也许没有很重要,但是对于单一审计师而言却相当重要<sup>[20-21]</sup>。另外,留住客户将会给审计师个人带来私有利益,比如工作保障、晋升机会以及事务所内部更大的权力。以上原因就让审计师个人在面对重要客户的时候更容易屈服和出卖独立立场。因此,我们在表 8 中将事务所层面的客户重要性替换为审计师个人层面的客户重要性并重新运行前文假设的结果。表 8 中的 *IMP2* 是审计师个人层面的客户重要性。因为每年有两个签字审计师,所以我们先计算出每个审计师的客户重要性,然后 *IMP2* 等于两个审计师客户重要性的平均数。其中,每个审计师的客户重要性等于第 *t* 年客户 *i* 的审计收费除以该审计师个人第 *t* 年所有客户的审计收费合计数。除了 *KAM\_WORD* 模型以外,表 8 中 *KAM\_NUM* 和 *KAM\_REF*

模型中的交乘项  $DA \times IMP2$  都显著为负,与前面采用事务所层面的客户重要性所呈现出的结果基本一致。

(二) 结论性评价的干扰排除

我们前面提及,  $DA$  与  $KAM$  并没有呈现出单调递减的走势,除了审计师不独立从而减少  $KAM$  披露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审计师对财务报告调整以后,风险降低到相当低的水平,但是仍然将审计过程中关注的内容披露为  $KAM$ ,并注明“ $KAM$  是合理的, $KAM$  金额可接受和没有发现  $KAM$  存在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DA$  很小但是  $KAM$  却很多,也会导致  $DA$  与  $KAM$  的相关关系非递减,由此对我们前面的结论造成干扰。这种结论性评价需要审计师实质上将审计风险调低到一个低水平,因此  $DA$  会很小。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将整体样本中  $DA$  小于中位数的样本排除,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结论性评价对我们结论的干扰。表 9 中剔除掉  $DA$  小于中位数的样本以后,交乘项  $DA \times IMP$  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表明排除结论性评价的干扰以后,我们的结论仍然稳健。

(三) 倾向分数匹配法

根据上面分析,我们认为较为严重的  $DA$  会加大审计师风险认知并增加  $KAM$  披露,但是严重  $DA$  的公司与不严重  $DA$  的公司很多特征上面是不一样的。我们很难分清楚到底是  $DA$  还是这些差异性特征导致了最终不同的  $KAM$  披露。为了缓解这方面的内生性,我们采用倾向分数配对法(PSM)加以解决。具体的,第一步,我们采用一个 Logit 回归模型估计选择  $DADUM$  的倾向得分,并根据倾向得分筛选出匹配样本。 $DADUM = 0$  和  $DADUM = 1$  两组样本在匹配前应该呈现出公司特征的差异性,在匹配之后应该呈现出公司特征的相似性(其匹配效果展示在表 10 的 Panel A)。第二步,我们根据筛选后的样本重新进行前面的操作,回归的结果展示在表 10 的 Panel B 中。

第一步 Logit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是  $DADUM$ ,解释变量有  $SIZE$ (企业规模)、 $LEV$ (财务杠杆)、 $GROWTH$ (企业成长程度)、 $ROA$ (资产净利率)、 $CFO$ (净现金流量)、 $REVREC$ (存货与应收款)、 $C\_SCORE$ (会计稳健性)、 $LNBOARD\_NUM$ (董事会人数自然对数)、 $ST$ (是否  $ST$  公司)以及  $BIG4$ (是否由四大审计)。由于  $DADUM$  严重的数量比较少,因此我们保留  $DADUM = 1$  的公司,在  $DADUM = 0$  的公司中寻找倾向得分与  $DADUM = 1$  的公司相近的公司,并按照 1:1 不放回的方式寻找配对样本。从表 10 的 Panel A 可以看到,匹配之前  $DADUM = 0$ (盈余管理不严重)和  $DADUM = 1$ (盈余管理严重)两组样本在很多公司特征方面存在差异,后者的公司规模更小,财务杠杆更高,业绩更差,现金流更少,董事会人数更少,成为  $ST$  公司的概率更高。而在匹配之后,两组样本的特征趋于一致,各个变量的均值差异都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我们的匹配效果良好。

表 10 的 Panel B 是筛选出匹配样本以后,我们重复之前操作的回归结果。前三列是  $DA$  对  $KAM$  影响的结果,后三列是  $IMP$  调节作用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前三列  $DADUM$  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重要客户对  $KAM$  披露产生了干扰。后三列交乘项  $DADUM \times IMP$  的系数显著为负数,  $H_1$  的结果得到支持。这些结果与我们采用 PSM 方法之前的结果是一致的,表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后,我们的结论依然稳健。

表 8 稳健性检验审计师个人层面的客户重要性

	(1) NUM	(2) REF	(3) WORD
DA	2.2563 ** (2.2967)	2.1721 ** (2.3442)	0.369 (1.0466)
IMP2	0.4006 *** (2.5769)	0.220 (1.5096)	0.0445 (0.8051)
DA × IMP2	-3.0512 * (-1.8646)	-3.0266 * (-1.9561)	-0.473 (-0.8087)
CONTROLS	YES	YES	YES
IND/YEAR	YES	YES	YES
截距项	YES	YES	YES
N	1707	1707	1707
LR Chi2/F	102.99	63.6	2.96
Pseudo R <sup>2</sup> /R <sup>2</sup>	0.031	0.0133	0.0471

注: CONTROLS 是控制变量,包括 SIZE、LEV、GROWTH、ROA、LOSS、CFO、REVREC、C\_SCORE。

表 9 稳健性检验剔除掉 DA 比较小的样本

	(1) NUM	(2) REF	(3) WORD	(4) NUM	(5) REF	(6) WORD
DA	0.769 (1.5457)	0.183 (0.3891)	-0.0654 (-0.3618)	1.5532 ** (2.5613)	0.765 (1.4107)	0.115 (0.5524)
IMP				7.3505 *** (4.0724)	2.6861 * (1.8408)	1.6863 *** (3.0239)
DA × IMP				-63.3172 *** (-2.9221)	-24.8536 ** (-2.1263)	-11.1638 ** (-2.437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截距项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962	962	962	845	845	845
LR Chi2/F	66.68	35.5	2.683	83.8	37.9	2.182
Pseudo R <sup>2</sup> /R <sup>2</sup>	0.034	0.0126	0.0694	0.0489	0.0153	0.0696

注: CONTROLS 是控制变量,包括 SIZE、LEV、GROWTH、ROA、LOSS、CFO、REVREC、C\_SCORE。

(四)控制事务所固定效应

路军等研究发现 KAM 的披露有“模板化”特征,相同事务所的 KAM 披露非常相似<sup>[8]</sup>。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事务所固定效应来控制事务所披露模板化对本文结论造成的干扰。表 11 是加入了事务所固定效应以后的回归结果,表中结果显示,加入事务所固定效应以后,交乘项  $DA \times IMP$  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表明在控制了不同事务所 KAM 披露模板化特征以后,我们的结论是稳健的。

(五)互为因果的内生性处理

柳木华和雷霄认为 KAM 可以抑制盈余管理,也就是盈余管理与 KAM 可能互为因果<sup>[3]</sup>。为了缓解盈余管理与 KAM 互为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 2SLS 方法进行处理。我们的处理分两个步骤:第一步,将  $DA$  作为因变量,将原来模型 1 中的自变量  $SIZE$ (企业规模)、 $LEV$ (财务杠杆)、 $ROA$ (企业业绩)、 $CFO$ (企业现金流)、 $REVREC\_R$ (应收账款与存货)以及  $C\_SCORE$ (会计稳健性)作为自变量,另外将  $RPTLEND$ (大股东占款)、 $FER$ (财务费用率)、 $FORSUBS$ (境外子公司数量)、 $AUDCOMM$ (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 $BOARD$ (董事会人数)、 $BIG4$ (是否国际四大事务所)、 $BIG10$ (是否国内十大事务所)作为工具变量,经过 700 次拔靴,计算出  $DA$  的拟合值  $DA_{hat}$ ;第二步,将  $DA_{hat}$  替换上文中模型 1 和模型 2 里面的  $DA$  进行回归。

表 12 展示了 2SLS 解决因果倒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后的结果。Panel A 是第一阶段结果,我们将  $DA$  作为因变量,将工具变量作为自变量,经过 700 次拔靴,计算出  $DA$  的拟合值  $DA_{hat}$ ;Panel B 是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我们将  $DA_{hat}$  替换前面模型里面的  $DA$  进行回归。Panel B 的前三列是  $DA$  对 KAM 影响的结果,后三列是  $IMP$  调节作用(独立性影响)的结果。

从表 12 Panel B 的回归结果来看,前三列模型 1 中  $DA_{hat}$  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而在处理内生性问题之前,模型 1 中  $DA$  的系数(表 4)并没有都显著。这说明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后,就整体而言,盈余管理基本能够代表审计师对客户公司的风险认定,而审计师对于客户公司的 KAM 披露是大致符合这种

风险认定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1504 号要求审计师在确认 KAM 披露时应该考虑“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较高的领域或识别出的特别风险”和“与财务报表中涉及重大管理层判断(包括被认为具有高度估计不确定性的会计估计)的领域相关的重大审计判断”。这些判断都和客户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息息相关。我们看到  $DA$  与 KAM 显著正相关,说明大多数审计师在认真的认定企业的风险,审计师的认定和披露(KAM)是符合企业风险程度( $DA$ )的。这应该是监管层所乐于看到的结果。Panel B 后三列中, KAMREF 模型的交乘项  $DA_{hat} \times IMP$  系

表 10 倾向分数配对法

Panel A: 配对前后效果比较						
	匹配前			匹配后		
	MEAN DADUM = 0	MEAN DADUM = 1	MEAN DIFF	MEAN DADUM = 0	MEAN DADUM = 1	MEAN DIFF
SIZE	22.170	22.000	0.170 ***	22.080	21.990	0.090
LEV	0.355	0.395	-0.040 ***	0.403	0.392	0.011
GROWTH	0.256	0.591	-0.335	0.495	0.697	-0.202
ROA	0.033	0.003	0.030 ***	0.026	0.017	0.009
CFO	0.031	0.015	0.016 ***	0.022	0.017	0.005
REVREC R	0.033	0.034	-0.001	0.037	0.039	-0.001
C SCORE	32.530	13.510	19.020	36.250	6.966	29.284
LNBOARD NUM	2.128	2.088	0.040 ***	2.086	2.089	-0.003
ST	0.014	0.037	-0.023 ***	0.036	0.033	0.003
BIG4	0.052	0.036	0.016	0.060	0.036	0.024

Panel B: 配对以后结果						
	(1) NUM	(2) REF	(3) WORD	(4) NUM	(5) REF	(6) WORD
DADUM	0.00100 (0.0113)	0.00950 (0.1140)	0.00940 (0.2965)	0.0850 (0.8346)	0.102 (1.0804)	0.0237 (0.6594)
IMP				2.488 (0.8849)	4.6699 * (1.7610)	0.647 (0.6428)
DADUM * IMP				-6.0550 * (-1.7284)	-6.4503 ** (-2.0908)	-1.009 (-0.854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截距项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664	664	664	664	664	664
LR Chi2/F	35	27	1.619	39	31	1.527
Pseudo R <sup>2</sup> /R <sup>2</sup>	0.0270	0.0138	0.0620	0.0301	0.0161	0.0631

注: CONTROLS 是控制变量,包括 SIZE、LEV、GROWTH、ROA、LOSS、CFO、REVREC、C\_SCORE。

表 11 控制事务所固定效应

	(1) NUM	(2) REF	(3) WORD
DA	1.0921 ** (2.3594)	0.7631 * (1.8025)	0.242 (1.5887)
IMP	4.3479 * (1.9134)	1.950 (0.9081)	1.105 (1.4099)
DA × IMP	-46.3314 *** (-3.2083)	-21.0088 ** (-1.9656)	-10.0125 ** (-2.5288)
CONTROLS	YES	YES	YES
事务所	YES	YES	YES
IND/YEAR	YES	YES	YES
截距项	YES	YES	YES
N	1707	1707	1707
LR Chi2/F	281	163	4.877
Pseudo R <sup>2</sup> /R <sup>2</sup>	0.085	0.034	0.162

注: CONTROLS 是控制变量,包括 SIZE、LEV、GROWTH、ROA、LOSS、CFO、REVREC、C\_SCORE。

数不显著,但是 *KAMNUM* 以及 *KAMWORD* 模型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说明控制内生性影响以后,仍然能够看出审计师在对待不同重要性客户时的差别,即审计独立性对 *KAM* 披露的影响依然存在。这说明并非所有审计师的 *KAM* 披露都依照审计准则 1504 号,对待重要客户的差异化体现了审计师在准则规定与客户游说的夹缝中进行折中处理的态度。

### 七、结论与启示

在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组织开展审计报告模式改革的背景下,我国于 2016 年 12 月通过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1504 号,要求在审计报告中加入 *KAM*,披露审计过程中的重大事项以及审计风险事项,并披露相应的审计应对措施。这项改革被认为审计报告改变了过去只提供模糊答案的“YES OR NO”模式,替换为提供精确信息(比如具体审计事项以及具体审计应对程序)的新模式。尽管根据风险导向审计准则,审计师识别了重大审计风险,在审计工作结束前也必须将风险减低至可接受的低水平,但是基于抽样审计,基于审计师认知的有限性,甚至基于对审计师独立性的怀疑,没有人认为报表经过审计师审计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如果最后企业出问题,大概率还是会出现审计师指出的风险项目上面。

精确信息直接和精准地指向企业的财报项目本身,这些项目都将引起投资人的极大兴趣并可能放大检视,这将同时对审计师以及企业经理人施加压力。对于审计师而言,对项目错误的描述以及不恰当的审计应对都会给将来的政府监管或者投资人诉讼留下明确证据;对企业经理人尤其是有盈余管理动机的经理人而言,放大检视有可能暴露出企业盈余管理痕迹,让企业经理人的各种机会主义企图落空。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加大,审计师与企业经理人之间的冲突更加被强化,因此,审计报告模式改革营造了冲突环境。审计独立性问题在相对温和的关系中不容易被观察到,而在相对冲突的关系中,审计师的选择(到底重视客户带来的经济利益还是秉持专业操守、重视审计声誉以及行政监管成本)将更容易被清楚地看到。因此,审计报告改革为我们清楚观察审计独立性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机会。

审计师在面对增量的监管压力时,固然有可能加大审计力度,从而改进审计质量。但是,他们也有可能跟客户合谋,采用“形式化”和“模板化”的做法去应付监管要求,最终使改革流于形式,将改革的意图落空。这样,有问题的审计师和有问题的企业就可以隐藏在“模板化”的审计报告背后,依靠无差别待遇提供的“保护色”来规避监管机构和市场投资者的甄别与筛选。本次改革的特点是增加了审计细节化信息,不同公司的情况不同,具体细节当然也会有差异,而差异化才能够提供增量信息并对投资者有用。尽管学者将模板化解释为事务所固定效应(事务所制定了特定的工作流程和固定模板),另外,太多 *KAM* 披露项目会导致重点不突出(因此限制了不同公司 *KAM* 披露项目数的差距),然而我们认为部分公司为了隐蔽关键信息而减少 *KAM* 披露是导致不同公司间 *KAM* 披露差异缩小的重要原因。

我们的研究有以下有趣的发现。首先,审计准则 1504 号要求审计师在确定 *KAM* 披露时考虑重大错报风险

表 12 2SLS 解决因果倒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Panel A: 第一阶段结果			
	DA		DA
<i>SIZE</i>	-0.001 (-0.87)	<i>FORSUBS</i>	0.004 (0.36)
<i>LEV</i>	-0.011 (-0.89)	<i>AUDCOMM</i>	0.009 (0.38)
<i>ROA</i>	-0.068 (-1.04)	<i>BOARD</i>	-0.021 ** (-2.45)
<i>CFO</i>	-0.117 ** (-1.98)	<i>BIG4</i>	-0.008 (-1.26)
<i>REVREC_R</i>	0.054 *** (2.67)	<i>BIG10</i>	0.002 (0.55)
<i>RPTLEND</i>	0.054 *** (2.98)	截距项	YES
<i>FER</i>	0.000 (-0.02)	IND/YEAR	YES
<i>C_SCORE</i>	0.000 (-1.04)	N	1706
		Wald chi <sup>2</sup> (30)	72.49
		R <sup>2</sup>	0.07

Panel B: 第二阶段结果						
	(1) NUM	(2) REFER	(3) WORD	(4) NUM	(5) REFER	(6) WORD
<i>DAhat</i>	10.8437 *** (3.1212)	7.2363 ** (2.2405)	3.8912 *** (3.1725)	12.5995 *** (3.5598)	7.8736 ** (2.3993)	4.2334 *** (3.3990)
<i>IMP</i>				6.8793 *** (3.5760)	2.257 (1.2292)	1.6096 ** (2.3132)
<i>DAhat * IMP</i>				-90.6394 *** (-2.7938)	-33.45 (-1.1666)	-18.4323 * (-1.661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截距项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706	1706	1706	1703	1703	1703
LR Chi <sup>2</sup> /F	104	63	3.546	118	64	3.536
Pseudo R <sup>2</sup> /R <sup>2</sup>	0.0314	0.0132	0.0520	0.0358	0.0135	0.0558

注: CONTROLS 是控制变量,包括 *SIZE*、*LEV*、*GROWTH*、*ROA*、*LOSS*、*CFO*、*REVREC*、*C\_SCORE*。

并依照审计重要程度优选决定最终披露的 KAM。我们以非裁决性应计的绝对值  $DA$  作为重大风险的代理变量,通过手工收集 2017 年和 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 KAM 披露的项目数、索引项目数以及 KAM 披露文字数,考察  $DA$  对 KAM 披露的影响。我们在客户不重要的情况下看到两者的正相关关系,而在客户重要的情况下,两者的关系不显著。其次,我们将客户重要性  $IMP$  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在面对不同重要程度的客户时, $DA$  对 KAM 披露的影响是否改变。我们发现  $IMP$  弱化了原有的“ $DA$ -KAM 披露”正相关关系:即如果客户不重要, $DA$  与 KAM 披露正相关;如果客户重要, $DA$  与 KAM 披露的正相关关系消失了。我们将此解释为审计不独立导致了 KAM 披露减少,从而 KAM 披露与其应有的  $DA$  不匹配。

进一步地,我们思考:既然独立性影响了 KAM 披露,那么依靠外部机制(中注协约谈的行政监管机制)和内部机制(国际四大的声誉机制)是否能够通过改善独立性从而影响 KAM 披露?我们发现在非四大和非约谈样本组,审计师客户重要性对于弱化“ $DA$ -KAM 披露”正相关关系的作用显著;但是在四大和约谈样本组,客户重要性的弱化作用并不显著。因为客户重要性的弱化作用来源于审计师面对重要客户的时候丧失独立性,从而被经理人游说减少 KAM 披露,并最终导致 KAM 披露与其本身的风险程度不匹配,所以,在存在独立性保障机制(四大声誉和中注协约谈)的情况下,上述弱化作用不明显,而在独立性保障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上述弱化作用明显。

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考虑了结论性评价因素、事务所披露模板化因素以及盈余管理对 KAM 披露的非单调因素对论文结论形成的干扰,做出了审计师个人层面的客户重要性以及盈余管理虚拟变量等变量替换,也考虑了盈余管理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并采用 PSM 方法加以缓解。在经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后,我们的结论依然可靠。

尽管大多数学者认可审计报告改革之后对于信息沟通和审计质量的正面作用<sup>[1-2,4,42,50-52]</sup>,但是他们也许忽视了审计师和企业经理人并没有被动接受这种改变,他们可能在有限的政策空间内减少信息或者保留形式上而减少实质上的信息,又或者他们将自己伪装的跟大多数公司一样,从而隐藏起来。这些举动当然让政策的初衷落空,让政策的执行大打折扣。其实我们很难相信在既有的市场和法治环境没有太大变化的前提下,仅仅依靠披露方式的改变对于整体的审计结果会有什么巨大的影响。审计报告披露方式的改变给审计师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是压力到底让审计师倒向哪个方向(审计师在压力下更加积极和勇敢的监督不法行为还是审计师在压力下与客户合谋来糊弄政策制定者)则取决于原有市场和法治大环境是否改善。另外,到底是 KAM 披露影响了信息质量还是相反?也许不同程度的信息质量代表不同程度的机会主义动机,从而影响最终的 KAM 披露。所以,我们在研究 KAM 披露导致的经济后果时,应该更加注意这方面的内生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文认为 KAM 披露与盈余管理有关,但是实际上 KAM 披露也与非盈余管理的风险有关,比如诉讼、收购兼并以及税收等。这些非盈余管理类的风险将对结果形成干扰。另外,盈余管理与 KAM 披露的关系是单调但却并不是线性的。极端盈余管理才有可能对 KAM 披露产生影响,而一般程度的盈余管理并不足以让审计师进行 KAM 披露。同时,审计师与客户经理人关于 KAM 披露产生冲突是因为冲突双方预期披露或者不披露某敏感项目将有可能产生不利于自己的经济后果。但是,如果政策的发布高高举起,而政策的后续执行轻轻放下(比如,随着时间推移,审计师和客户经理人发现“原来随便披露也没什么”“反正跟大家披露的一样就会很安全”),那么在政策执行初期紧张的冲突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缓和。这样的话,也许我们就无法再观察到本文前面论述的审计师独立性对 KAM 披露的影响了。而这也并非监管层愿意看到的现象,审计监督职能就难以有效发挥。反之,如果在审计实践中,比如,某审计师因为故意隐瞒关键的 KAM 披露而被投资者起诉赔偿,那么 KAM 披露政策就不仅仅是空洞的纸面规定了,而是对审计师和经理人形成现实压力的有效治理工具。

在未来的研究方面,本文对 KAM 披露的度量只有 KAM 项目数以及文字数等方式,而 KAM 披露更多的信息需要通过文本分析,比如语调以及文本相似度等方式予以揭示。另外,本文认为面对客户压力的时候,审计师有可能减少关键 KAM 项目的揭露,从而帮助重要客户进行隐瞒。但是在中国,几乎所有公司的 KAM 披露项目都相差不大(大多数都是 2 项左右)。审计师更可能的做法不是减少项目,而是替换项目(用无关痛痒不是那么重要的项目去顶替原本应该揭露的关键项目),这些还需要未来研究找到有力证据。

## 参考文献:

- [1] 赵刚, 江雨佳, 马杨, 等. 新审计准则实施改善了资本市场信息环境吗? ——基于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研究[J]. 财经研究, 2019(9): 114-126.
- [2] 王木之, 李丹. 新审计报告和股价同步性[J]. 会计研究, 2019(1): 88-94.
- [3] 柳木华, 雷霄. 审计师利用专家工作抑制盈余管理了吗? ——基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20(1): 78-86.
- [4] 李延喜, 赛赛, 孙文章. 在审计报告中沟通 KAM 是否提高了盈余质量? [J]. 中国软科学, 2019(3): 120-135.
- [5] 王艳艳, 陈汉文. 审计质量与会计信息透明度——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 会计研究, 2006(4): 11-17.
- [6] 路军, 张金丹. 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初步研究——来自 A+H 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18(2): 83-89.
- [7] Gimbar C, Hansen B, Ozlanski M E. The effects of critical audit matter paragraphs and accounting standard precision on auditor liability[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6, 91(6): 1629-1646.
- [8] 张金丹, 路军, 李连华. 审计报告中披露 KAM 信息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吗? ——报表盈余和市场感知双维度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19(6): 85-91.
- [9] Gutierrez E, Minutti-Meza M, Tatum K W, et al. Consequences of adopting an expanded auditor's report in the United Kingdom[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8, 23(4): 1543-1587.
- [10] 薛刚, 王储, 赵西卜. 谁更关心关键审计事项: 管理层还是分析师[J]. 审计研究, 2020(2): 87-95.
- [11] Brasel K, Doxey M M, Grenier J H, et al. Risk disclosure preceding negative outcomes: The effects of reporting critical audit matters on judgments of auditor liability[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6, 91(5): 1345-1362.
- [12] 韩冬梅, 张继勋. KAM 披露与审计人员感知的审计责任[J]. 审计研究, 2018(4): 70-76.
- [13] 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PCAOB). Supplemental request for comment: Rules to require disclosure of certain audit participants on a new form[EB/OL]. (2015-01-01)[2019-12-02]. [http://pcaobus.org/Rulemaking/Docket034/Rules/Release\\_2015-005-ARM.pdf](http://pcaobus.org/Rulemaking/Docket034/Rules/Release_2015-005-ARM.pdf).
- [14] Katz D. Revamped audit report seen launching "wave of litigation"[EB/OL]. (2014-04-02)[2019-12-02]. <https://www.cfo.com/auditing/2014/04/revamped-audit-report-seen-launching-wave-litigation/>.
- [15] Gaetano C. PCAOB's expanded audit report proposal raises litigation concerns[J]. The Trusted Professional; Newspaper of the New York State Society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2014, 17(5): 1-5.
- [16] Ernst Young LLP. Comments to the PCAOB re: Proposed auditing standards on the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regarding other information and related amendments, PCAOB Rule making Docket Matter No. 034[EB/OL]. (2013-01-01)[2019-12-02]. <https://pcaobus.org/Rules/Rulemaking/Pages/Docket034.Comments.aspx>.
- [17] Phillips J R. Do audit report disclosures lead to increased liability exposure? An investigation of juror's consideration of auditors' disclosure of significant deficiencies in internal control[R]. Working paper, 2015.
- [18] Reynolds J K, Francis J R. Does size matter? The influence of large clients on office-level auditor reporting decision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0, 30(3): 375-400.
- [19] Chung H, Kallapur S. Client importance, nonaudit services, and abnormal accrual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3, 78(4): 931-955.
- [20] Chen S, Sun S Y J, Wu D. Client importance, institutional improvements, and audit quality in China: An office and individual auditor level analysi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0, 85(1): 127-158.
- [21] Chi W, Douthett Jr E B, Lisic L L. Client importance and audit partner independe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2, 31(3): 320-336.
- [22] 冉明东, 徐耀珍. 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改进研究——基于我国审计报告改革试点样本的分析[J]. 审计研究, 2017(5): 62-69.
- [23] 吴溪, 范昱江, 杨育龙. KAM 与审计后会计信息质量相关吗——来自资产减值事项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19(12): 65-71.
- [24] Bernard V L, Thomas J K. Evidence that stock prices do not fully reflect the implications of current earnings for future earn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0, 13(4): 305-340.
- [25] Frankel R, McNichols M, Wilson G P. Discretionary disclosure and external financing[J]. Accounting Review, 1995: 135-150.
- [26] Loughran T, Ritter J R. The new issues puzzle[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5, 50(1): 23-51.
- [27] Perry S E, Williams T H. Earnings management preceding management buyout offer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4, 18(2): 157-179.
- [28] Barth M E, Elliott J A, Finn M W. Market rewards associated with patterns of increasing earn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9, 37(2): 387-413.
- [29] Burgstahler D, Dichev I. Earnings management to avoid earnings decreases and loss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7, 24(1): 99-126.
- [30] Gaver J J, Gaver K M, Austin J R. Additional evidence on bonus plans and income managemen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5, 19(1): 3-28.
- [31] Guidry F, Leone A J, Rock S. Earnings-based bonus plans and earnings management by business-unit manager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9, 26(1-3): 113-142.
- [32] Holthausen R W, Larcker D F, Sloan R G. Annual bonus schemes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earn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5, 19(1): 29-74.
- [33] DeAngelo L E. Auditor size and audit quality[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1, 3(3): 183-199.
- [34] 涂建明, 朱澜媛. 新审计报告改革影响了银行信贷决策吗? [J]. 现代财经, 2019(11): 34-52.
- [35] 王生年, 李超凡, 徐亚飞. 国际“四大”缓解了应计异象吗? [J]. 投资研究, 2015(12): 128-138.

- [36]郭照蕊,黄俊. 国际“四大”与高质量审计的再检验——基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分析[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5(3):115-124.
- [37]Becker C L,DeFond M L, Jiambalvo J, et al. The effect of audit quality on earnings management[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1998,15(1):1-24.
- [38]Francis J R,Krishnan J. Accounting accruals and auditor reporting conservatism[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1999,16(1):135-165.
- [39]Eshleman J D,Guo P. Do Big 4 auditors provide higher audit quality after controlling for the endogenous choice of auditor? [J]. 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2014,33(4):197-219
- [40]黄益雄,李长爱. 行业自律监管能改进审计质量吗? ——基于中注协约谈的证据[J]. 会计研究,2016(11):84-91.
- [41]吴溪,杨育龙,张俊生. 预防性监管伴随着更严格的审计结果吗? ——来自中注协年报审计风险约谈的证据[J]. 审计研究,2014(4):63-71.
- [42]陈丽红,易冰心,殷旻昊,等. 行业专家审计师会充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吗? [J]. 会计研究,2021(2):164-175.
- [43]曾家璋,史雅男. 会计师产业专精与关键核查事项揭露之关联[J]. 中华会计学刊,2019(1):37-76.
- [44]李晓月,肖翔,贾丽桓. 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保险价值——基于审计师保险动机与投资者反应的双维度检验[J]. 经济经纬,2021(4):83-92.
- [45]潘克勤.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改变了审计师的审计责任意识吗? ——基于审计定价视角[J]. 经济经纬,2020,37(3):108-116.
- [46]李奇凤,路军伟. 关键审计事项段的特征具有信息含量吗? ——来自中国 A 股上市公司 2017 年报审计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1(2):30-40.
- [47]Roychowdhury S.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6,42(3):335-370.
- [48]Khan M,Watts R L. Estimation and empirical properties of a firm-year measure of accounting conservatism[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9,48(2-3):132-150.
- [49]涂建明,朱渊媛. 新审计报告改革影响了银行信贷决策吗? [J]. 现代财经,2019(11):34-52.
- [50]张继勋,倪古强,张广冬. 关键审计事项的结论性评价与投资者的投资判断[J]. 会计研究,2019(7):90-96.
- [51]徐硕正,张兵. 新审计报告与资本市场的信息反应——来自股价同步性和股价预测能力双维度的经验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3):45-57.
- [52]杨明增,张钦成,王子涵. 审计报告新准则实施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基于 2016 年 A + H 股上市公司审计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 审计研究,2018(5):76-83.

[责任编辑:刘 茜]

## The Effect of the Auditor Independence on KAM Disclosure: Client Importance Perspective

FU Qiang<sup>1,2</sup>, LIAO YiHsing<sup>2</sup>

(1. School of Accounting,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2. College of Business,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pei 320314,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w audit report model, the disclosure of detailed information increases auditors' responsibilities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auditors and companies (especially companies with earnings management motives). Auditors will face the test of audit independence: strict enforcement to reduce their own responsibilities or compromise and help companies reduce KAM disclosures to hide key information. We found that: First of all, theoretically, the severity of earnings management represents greater audit risk and the possibility of more KAM disclosures. However, we only found that earnings management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KAM when the clients are not important,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variables is not significant when the clients are important. The more important the client is, the less obviou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rious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KAM. We attribute this to the manager's lobbying auditors to reduce KAM to cover up earnings management under the motivation of earnings management. Secondly, Big 4's reputation and the AICPA interview help to improve independence. Even if the auditors face important clients, they will not be persuaded by managers to reduce KAM, but will make equivalent KAM disclosures based on the severity of earnings management. Our research helps to remind the supervisory authorities; Although the KAM reform puts pressure on auditors, their independence status has not been changed. Instead, they have helped important clients reduc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ithin a limited policy space.

**Key Words:** KAM disclosure; earnings management; client importance; audit independence; audit reputation; audit report reform; accounting supervision